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 ②

李治亭
苗壮 主编
李家巍

佛在神州

中国佛教

● 李海涛 王艳春
古岩 著



辽海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

佛在神州

——中国佛教

李海清 王艳春 古岩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在神州：中国佛教/李海涛等著. —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8. 7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李治亭，苗壮，李家巍主编)

ISBN 7-80638-865-6

I. 佛… II. 李… III. 佛教史-中国 IV. 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8099 号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李治亭 苗 壮 李家巍

副主编：王升元 王海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申 王升元 王海明

王朝增 丛曙光 刘英奎

李治亭 李家巍 苗 壮

郭信聚 韩锡铎

前 言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是我们为全国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撰写的一套综合性的知识读物。出版之际，我们愿把一些想法直接告诉热心的读者。

这套《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推出 30 册，它包括了文学、历史、哲学、法律、艺术、民俗几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几个方面分别涵盖在文、史、哲这三门学科之内。从广义上说，它们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在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总量中，社会科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在社会科学中，如文学、历史、哲学等，不能不居于首要地位。文学是以形象思维描写人，历史是以科学的逻辑思维研究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的演变，哲学则是研究人的思维方式、方法，即人的世界观。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体现出不同的思维范畴与研究手段。但它们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或描写。人是社会的主宰。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如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艺术等等，都是靠人的主观活动及操作而存在，而发展。即使如当今一切最先进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无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每个时代，如没有一批具有高度

文化素养的人，就不会有重大的发明创造。可见，从个人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文化素养的高低，不能不决定一代社会发展的水平。换言之，一个民族或国家，其社会科学发达的程度，必然制约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都是在封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出现的，即是明证。如果说，一切的自然科学是在探索大自然及整个宇宙的秘密，进而改造自然及整个宇宙的秘密，进而改造自然，为人类谋取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那么，社会科学就是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及社会变革的规律，用以改造人类自身，造就成高度文明和高度素养的人，进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显然，在人类的所有科学中，社会科学理所当然地居于首位，是起领导作用的科学。而文史哲是社会科学的精髓、核心。

我国著名的哲学史专家、佛学家任继愈先生深刻地阐明文史哲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他说：“文史哲这几门学科，虽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却代表着民族的性格，最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文史哲是民族灵魂所在，一定不能忽视。在我看来，忽视文史哲的民族是最贫困的民族。”我还想补充一句：也是最愚昧的民族。这是一代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学术探讨，才得出这一精辟的科学结论，发出了刻骨铭心的感叹。试看今日之域中，与先生有此同见者，竟有几人！我们看到，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文史哲已经受到忽视，甚至被排斥。在一些人看来，惟有科技才能创造财富，惟

有搞经济才能带来实惠。嘲弄文史哲，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不能不受惩罚。请看，在经济改革中崛起的多少企业家纷纷“落马”，走向历史的反面。更有甚者贪污受贿聚敛财富，终于成为阶下囚。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训诫其兄弟子侄时说：财货乃身外之物，多藏无益。即便不义而富，能有不死之术而使自己永远享受的吗？太祖时代的大臣，活到现在的有几人？人的一生，如寄身于天地间这个大旅馆之中，何必为自己过多营谋？子孙如果贤能，则自会显达；子孙愚昧无知，你们即使留下很多产业又有什么用？根本的问题，惟建功立业可垂永久，这才是最宝贵的！

很可惜，一些人的识见连 300 多年前的一个满族皇帝都不如。如果那些“落马”的企业家们能够读读皇太极的这段话，并接受劝诫，也许就不会在金钱上栽斤头。他们的失败，各有具体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文化素养低下，思想品位庸劣，经不住成功的陶醉或各种货财或美色的诱惑，乃至愚昧无知，利令智昏。

以上所说，似乎扯远了。其实不然。我所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必须接受社会科学主要是文史哲的熏陶，学习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把自己熔铸成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品位的内实外雅的高尚之人。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借助社会科学，促使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在当今改革、经济突飞猛进之时，尤其呼唤精神文明。如果以为经济

上去了，精神文明也就上去了，实为大错特错的愚昧之见。事实表明，经济建设固然不易，而建设精神文明，重铸民族文化的品格更难，绝不是像毁一座楼房另建一座新楼房那么容易，相反，这需要一代至几代人的不断探索，不断变革陈规陋习，不断摒弃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丑恶，才能形成一代民族的文化新风。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与出版，不仅仅提供文史哲方面的丰富知识，更重要的是，它着眼于改善和提高青年的文化素质。近年来，有关历史与文化的知识性的、学术性的书，有如铺天盖地而来。为青少年写的书，也是名目繁多，内容无所不及，多得数不胜数。不过，专为青少年写的历史与文化类丛书并不多见。青少年正是吸纳知识、为未来人生奠基的重要阶段。思想品德的修养，理想与志向的选择，世界观的确立，主要有赖于这个阶段的努力程度。一句话，人一生之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少年时期学习之成败。因此《中国历史文化丛书》之出版，能给青少年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

这套丛书内容广泛，又相对集中。中国历史文化，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可以说，涵盖了中国自古至今的全部历史与全部文化。从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归纳为30个专题。比如，就文学艺术来说，已选了散文、诗、词、赋、民歌、戏曲、小说等；哲学则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两宋、清及晚清等几个重要时代的哲学；民

俗方面，已选了服饰、节日、嫁娶等；历史有历代改革、帝位之争、农民起义、英雄人物等。从《中国历史文化丛书》整体看，内容相当广泛；从个别看，又都是具体的，集中在一个问题，成一个中心。从纵的方面说，各书内容具有内在联系，勾勒出中国历史与文化演变的轨迹，构成了一个整体；从横的方面看，各个内容独自成书，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以此纵横交错，“组合”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个系列。当然，这不是惟一的系列，人们还可以从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中，重新选择，重新“组合”，只要选取准确，“组合”趋于合理，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同。本套丛书的“组合”基本合理，就在于这些内容基本反映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面貌，并且也适合青少年阅读，与他们的理解能力相适应。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去繁就简，简明扼要。如《诗渊歌海——中国历代诗》所言，中国诗歌向称发达，有数千年之积累，汗牛充栋，恰似汪洋大海，仅写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没有厚厚的几本书，是难以写尽全貌的。其它如《宫廷剑影——中国历代帝位之争》、《欢乐的日子——中国传统节日》等等，每个题目都很大，时间跨度长，内容更为繁富，绝非一本小书所能容纳的。为适应青少年读书方便，省时省力而收实效。我们采取“大题小作”的原则，把每项内容加以科学地浓缩，删繁取简，弃长用短，既要从客观上把握全局，又把局部具体化，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抓住精髓，做到少而精。

其次是，与此相适应，文字少，篇幅短，每本书不过七八万字，用时不多，就可以读完全书。现在写书，越写越长，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是不宜的。文字通俗化，适应青少年的识读能力，是本丛书的又一特点。具体说，原属深奥的道理，化为通俗讲解；原为难懂的古文，改用现代语言表述，力求读者读懂读通。所有这些，都是为青少年便于阅读和理解书中内容而设计的。

如何读这套书，不妨也说几句。读书，首先要读懂，读不懂等于没读。不易懂之处，不妨多读几遍，反复思考，也就懂了。如求教他人，也是一种简捷之法。古人强调读书务在“明理”。所说“理”，就是是非之理、做人之理，处人处事之理，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是谓“明理”。《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给人以启迪和借鉴，是不言而喻的。读此书而不明理，也是白读！最后，读书全是为了应用。与“明理”相联系，能把书中得到的教益，求诸自身，化为实践，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克服人性的弱点，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作者多，难免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未必完全一致；加之每本书涉及内容繁富，取舍不当之处在所不免，望读者批评教正。

李治亭

于南湖新村寓所

1998年2月25日

概 说

佛教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产生于公元前 6——5 世纪，此时的中华正处于春秋时期。佛教的创始人叫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者”之意，他本姓乔达摩，名悉达多，中国古译为瞿昙（qú tán，音渠坛）。乔达摩·悉达多是净饭王太子，生于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伴随着佛陀传奇的一生，佛教自鹿野苑初转法轮始，便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流传。据文献史料推断，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 565 年，卒于公元前 490——486 年之间，略早于我国的孔子（前 551——479）。圣哲虽逝，佛法长存，佛教在印度的传播，大致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四个历史时期。13 世纪初，因外族异教徒入侵，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消失，19 世纪后稍有复兴。

印度佛教虽消亡了，但在其它国家却广泛流传。佛教在亚洲的传播主要沿两条路线：向南传入斯里兰卡及印度支那半岛诸国；向北传入中亚，于两汉之际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

佛教在中国两千年间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汉代至南北朝 500 年间，为第一阶段。此时的佛

教在中华由初时的依附于神仙方术，到与魏晋玄学的密切融合，改头换面发展迅速，主要代表人物是外国译经僧人，他们不仅是主译者，而且也是该译本的宣传者。伴随着译经日增，六家七宗应时而起。隋唐时代，中华佛教进入了创造、发展、繁荣时期，历时约半个世纪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过程，为第二阶段。中华大地，僧徒遍布，寺院林立，宗派繁杂。西藏佛教开始发展，此时佛教重心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其代表人物几乎全部是中国僧侣，不仅在佛典翻译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中国佛教诸多学派的创始人均著书立说，表现出中华佛教极大的创造性，如智顗、慧能、法藏、澄观，以及后来的中兴祖师，如宗密、湛然、知礼等，呈现出中国佛教理论研究的新面貌。第三阶段自北宋始，终于清末民初，持续近 1000 年。此时在中华的佛教由与儒、道三教鼎立转化为以儒教为主，释、道次之的局面，并趋于合流，清末西方近现代思潮涌入后，中国佛教日趋衰微。

综上所述，佛教自古天竺传入中国后，由混同于神仙方术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到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糅合而成为分庭抗礼的精神支柱，从改头换面到脱胎换骨，以轮回之说追求人生的解脱，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成为具有完备教义和理论体系的中国式佛教。佛教在中华，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回味无穷。

目 录

前言	1
概说	1
一、中国的云遮外国的月	1
二、枝发三桠	6
1. 承后汉余绪	6
2. 借王者之力	8
3. 以实物为证	10
三、救命的稻草	12
四、外来的和尚念好经	18
1. 两个中心竞光辉	19
2. 三个政权礼高僧	22
五、遍地佛花分外香	29
1. 南朝四代承一统	29
2. 北朝礼佛有峰巅，有低谷	34
六、巨人的肩膀	40
七、佛、释、道，孰先？孰后	47
1. 十九帝崇佛一帝灭佛	47
2. 儒释道三教时有高下	49
3. 唐代佛系蔚为大观	52
4. 佛名远扬东渐东亚，西至吐蕃	64

八、一枝独秀在南国	72
九、从分庭抗礼到位居儒后	77
十、后来居上的契丹国佛教	86
十一、善摘“桃子”的女真佛教	90
十二、撩开神秘面纱的国教	94
十三、衰落背景中的亮色	102
十四、日薄西山的挽歌	111

一、中国的云遮外国的月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迄今还难稽考，一般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浮屠经》（浮屠，梵文，佛塔之意）为据，认为西汉末年佛教传入的开始，也有人认为佛教是东汉初期传入中国的。据成书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记载，东汉永平七年（64）的一天夜里，明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光芒四射的金人在自己居住的殿堂之前飞行，而自己对这金光闪闪的“陌生人”只能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境地。明帝百思不得其解，就在第二天上朝时给大臣们讲了自己的梦，并问大臣们说，昨夜飞来的金人是何方之神呢？太史傅毅出班答道：皇上，西方有神，其名曰佛，轻举能飞。陛下所梦的大概是他。明帝听了很高兴，就派使臣蔡愔等人去西域寻求西方之佛。永平十年（67），蔡愔一行经长途跋涉在大月氏国遇见了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盛情邀请他们去汉地传经布道，宣扬佛教。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接受了邀请，用白马驮着经卷，随蔡愔来到了洛阳。明帝非常高兴，给予他们很高的礼遇，特意为他们建立了精舍，因白马驮经故命名为“白马寺”。这是中国的第一所佛寺。而迦叶摩腾和竺法

兰在白马寺内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

东汉是佛教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代。汉代人们的信仰在佛教传入时并不是一片空白，汉武帝以后儒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以及黄老之学、神仙方术、谶纬迷信等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所以佛教初入汉土，为了生存发展，不得不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结合。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佛教没什么特殊，不过是神仙方技的一种，它的教理是“清虚无为”，“佛”不过是诸多大神中的一位，就连斋忏等佛教仪式也效法当时流行的祠祀。又因它是外来者和后来者，因此也未引起人们特殊的重视，信仰的范围也不广泛，颇有些云遮月的味道，而且是中国的云遮住了外国的月。佛教最初在汉代上层统治阶级中流传，这在史料记载中是不乏见的。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干了许多违法的事。明帝颁布了一条诏令，说犯死罪的人，只要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丝缣，就可以免去死罪。刘英做贼心虚，急忙如数交纳缣帛请明帝赦免死罪。明帝下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疑而赎其罪？”这是说刘英好黄老之学，也信佛教，因此有什么嫌疑害怕用丝缣去赎免罪过呢？到了汉桓帝时，桓帝又在宫禁中用黄金铸了浮屠、老子像，并亲自在濯龙宫中设立供位，上罩仪仗中使用的盖，用祭天的音乐奉事佛与老子，可见当时东汉的宫廷奉佛，确实把“佛”等

同于黄老之学。随着佛教传播深入，汉代民间也开始奉佛。以祈福、治病、占星、禳灾等方式吸引民众，虽依附于神仙方术，但信徒还是渐渐多起来。信佛出家修道的人就是僧侣，又叫沙门。史书中虽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①的记载，但语出伪书《汉法本内传》，故不足置信。汉人出家为沙门最早见于载籍的是严佛调，《出三藏记集·安玄传》称“沙门严佛调”，还说他“出家修道”，因此严佛调是第一个汉族出家人。他撰写的《十慧章句》，是汉族佛教徒撰写的第一部经书。又由于佛教当时初来乍到，教风未纯，只要剪落须发就算出家，所以又有人认为三国时的魏国人朱士行才是最早的沙门。魏嘉平二年（249），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国才有真正意义的正式沙门，而朱士行最早登坛受戒，所以有此一说。至于当时的民间有无佛寺造像，文献中有正史记载说明汉献帝时已有佛寺造像。献帝统治时期，有一个叫笮融的人，他把广陵、下邳、彭城三郡所需用的漕粮，全部用来“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 3000 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笮融不仅建寺，而且建的很大，殿阁巍峨，可容 3000 多人，寺中还造有身穿锦彩衣物，

① 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